

應積極拓展國家內需市場

楊孫西

揚清激濁

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在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再次提出擴大內需，給祖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發展帶來千載難逢的機遇。國際經驗表明，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大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內需。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國家和民間財力日益雄厚，現時確應擴大基建投資和增加消費，以龐大的內需市場帶動經濟穩定地增長，實現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何把握國家發展新方向，如何更好地把香港的未來與國家繁榮富強的發展趨勢緊密相連，以避免香港競爭力減弱，甚至邊緣化，這是需要香港社會各界加以探討和研究的新課題。

大中華經濟圈增長潛力巨大

業內人士估計，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能與過去十年相同，保住至少7.5%的速度增長，再加上人民幣以每年3%的速度升值，相信十年之後，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今日中國人均收入約5000美元，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就是人均收入1萬美元。國家有13億人口，以人均收入1萬美元計算，將會形成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中國有7.4億農民，根據十七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到2020年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標，每年將遞增6%，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市場。內地的保險事業、社會福利事業、醫療服務業，乃至九年制義務教育，也都存在着

很多商機。

目前，大中華經濟圈已是全球最重要的市場之一，且增長潛力巨大。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享有優先地位，又擁有自由市場經濟，在許多領域與國際接軌，致令香港擁有服務內地消費力的優勢。本港服務內地消費力，包括傳統的金融、貿易、旅遊、零售；潛在的教育、醫療、仲裁、會計，內企拓展海外的基地等。本港在發展新興產業方面，應改革教育、醫療制度；大幅提高本港大學學額。尤其應培養更多的會計、法律等本港優勢行業的人才，提供優惠發展區等政策，積極與內地各級政府、商界洽商爭取訂單，主動幫助本港相關行業拓展內地市場等。

城鎮化帶動基本建設投資

不可否認，國家的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遠未完成，但蘊含的內需潛力十分驚人。比如，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住房也未達到飽和，房地產業仍存在着很大的上升空間。據統計，在未來三十年裡，中國還將有三億左右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這將極大刺激對住房的需求，給房地產業創造更大的發展空間。

按照十八大提出的戰略部署，未來十年，政府將增加基建投資，民間增加消費。基建投資縮短城鄉之間的距離，縮短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距離，產生同城化、鄉村城鎮化的效應，快速增加城鎮居民的比例。可以預見，將來城鎮居民生產力大大提高，有利發展現代製造業、服務業等，進一步開拓國家內需市場，保持GDP以每年至少7%的速度增長，逐步邁向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推廣香港品牌的最佳契機

眾所周知，香港最早參與國家的改革開放，其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港商除了自身事業的發展，亦帶動了國家經濟發展、出口創匯以及就業，促進社會穩定等。香港製造業等中小企業是本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在新的歷史時期，應注重幫助業界打造香港品牌，協助

港商往內地尋找新的商機，實現產業轉型。同時，積極吸引內地各省市來港投資，向世界推介香港的優勢，從而保持香港國際大都市及金融中心地位。

國家「十二五」規劃首次將有關港澳的內容單獨成章，而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已成為「十二五」規劃的重要目標之一。回歸祖國十五年來，在中央的支持下，粵港、閩港、京港、滬港等區域性的經濟合作已陸續展開，並且逐步得到深化落實，使香港在內地拓展了廣闊的經濟發展腹地。中共十八大閉幕剛六天即今年11月21日，新當選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會議核心詞語就兩字：「改革」。李克強在座談會上說：「我國三十多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甜頭已經嘗到。在新的起點上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讓群眾過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開放。這是我國發展的最大『紅利』。」可見，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將堅定不移走好改革之路，中國未來發展大有希望。

筆者認為，香港社會各界應高度重視十八大對於香港未來的影響，努力提高本港在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中的地位和優勢，進一步促進香港與祖國內地交流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積極拓展國家內需市場，促進互惠互補、共同發展。

十八大對香港政經的影響

郭一鳴
資深傳媒人

不可忘記維護中央權力

十八大報告中關於香港的內容不到500字，卻具有綱領性的重要意義，反映出中央對香港局面的判斷，同時透露出中央解決香港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存在某些問題的思路。

首先，報告指出「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中共一向把唯物辯證法作為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論，強調事物的有機聯繫，注重平衡。最近一個時期，香港反對派在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等政治問題上，不斷指摘中央干預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特別是南丫島海難事件中，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到醫院探訪傷者並表示可要求廣東協助救援工作，翌日竟然受到某些輿論指摘，上升到破壞「一國兩制」的高度。連救人也分「一國」還是「兩制」，用意何在？站在中央角度，這是對「一國兩制」的錯誤理解或者歪曲誤導。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在他的新作《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批評特區政府「有些時候也沒有帶頭充分做好尊重和維護中央的權威和權力」，「有意無意間忽略提醒港人中央在政制發展方面的最高權力」。十八大報告就是要提醒香港市民，在要求中央尊重「兩制」差異、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時，不可忘記堅持「一國」原則，維護中央權力，發揮內地堅強後盾的作用，否則就不符合「一國兩制」的精神。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再定位」。

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力度必會加大

其次，報告指出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胡錦濤在5年前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到「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這次「堅決反對」變成「防範和遏制」，顯然中央認為光是「反對」不足阻止外部勢力干預，所以必須採取措施，一手做好防範，一手遏制干預行動。中央對外部干預香港事務的擔心升級，應非空穴來風。剛退休的終審庭法官包致金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承認，回歸後1999年首次人大（就居港權案）釋法，他曾經向美國駐港領事透露5名終審庭法官想集體辭職。在北京看來，這便是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明證。眾所周知，中央對外來干預一向十分敏感，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時訪問南美洲國家，曾經對於西方國家干預中國內政、對中國指手劃腳的做法公開表示不滿，展示作風強硬一面。中央究竟會採取哪些措施？23條立法固然是中南海所樂見，包括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為香港媒體撰文時指出，23條立法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憲法責任。但梁振英的特區政府顯然短期內沒有能力就這個高度敏感的問題促成社會各界達成共識。無論如何，外來干預為中央所不容，反對派各政黨團體，還是小心避免引起誤會為宜。

香港在「國家事務」中有角色、有責任

報告還指出，堅信港澳同胞「一定能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後半句是有的放矢，前些日子有示威者打出港英時代的米字龍獅旗，甚至自稱「不是中國人」；特區政府在學校推行國民教育遇到強大阻力，被迫擱置；有大學民調顯示，香港人對身為中國人的認同感回歸以來新低，這些現象與香港回歸祖國15年的歷史進程格格不入，但中央並不擔心所謂「港獨」，充滿自信。前半句「一定能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其實更加重要，更值得深入分析解讀。首先，這句話提醒港人，香港作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在「國家事務」中有角色、有責任，這與改革開放30年來港商對內地經濟發展的作用和貢獻不盡相同。其次，這句話透露出中央對香港在國家事務中的作用充滿期待，這一點對特區政府、對商界至關重要。香港擁有政治上「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作為國際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不僅因為有開放的金融體系和完善的監管制度，更因為有祖國在背後給予全方位的支持，這是國際上其他競爭對手對香港極為羨慕卻永遠無法企及之處。特區政府和商界應該把握機遇，認真思考如何把香港的種種優勢放到國家事務的層面上去發揮，追求雙重乃至多重的效益。

習近平對香港不陌生

除了十八大報告，新的中央領導層誕生，新的人事佈局也會對香港帶來一定影響。習近平出任總書記之後，主管港澳工作的中央港澳工作小組組長將會換人，七常委中以劉雲山和俞正聲呼聲最高，也有消息指政治局委員李源潮會接替港澳小組。但無論誰主管港澳工作，有一點可以肯定，港澳工作重大事情拍板，最終都要經過總書記習近平。習近平對香港並不陌生，北京奧運會前曾到香港視察馬術比賽籌備工作，其細緻、務實作風和平易近人的姿態給香港市民留下深刻印象；在當選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之後記者會上的講話，延續他一貫務實和富有人情味的作風，令人耳目一新。總而言之，中共十八大之後，新人事，新作為，必定會有新的格局，中國內地如是，香港也如是。（本文轉載自《紫荊雜誌》12月號）

拉布暴露議會弊端 政府絕不能讓步

徐庶

這次「長者生活津貼」的角力，政府和建制派絕對不可以後退半步。這是癱瘓香港和維護香港的角力，這是香港合理運用資源扶貧還是走上希臘破產道路的命運角力。如果政府和建制派後退，少數凌駕多數，政府的運作能力喪失，成為香港議會的遊戲規則，這將是一場大災難。

香港社會崇尚民主，但是立法會的議事規則，存在嚴重的弊端，嚴重地違反了民主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一個人拉布，製造了「長津長無」的畸形現象，可以否定了其餘多數的議員的意向，使立法會陷於癱瘓，使民生撥款不能通過。問題在於，當一個人影響了七百萬人的經濟和民生權利的時候，立法會議員有沒有規條可以剪布，結束重複而無聊的、損害多數民眾利益的議員的胡鬧行為。

拉布嚴重浪費公共資源

如果對議員沒有任何約束，整個立法會的社會形象就會破產，市民覺得立法會就是「垃圾會」，立法會議員連制訂有效的會議運作規則的良知、能力和智慧都沒有，空談運轉。民主黨劉慧卿點名批評民建聯「人多蝦人少，欺人太甚」，民主黨不會坐以待斃，「睇大家燃燒多少青春！」民主黨單仲偕更恐嚇，日後當某國謙的「剪布」動議上抬，反對派會繼續就其動議提出二十萬、三十萬、四十萬項修訂，拉足四年。

這說明了一些自稱民主的政黨，口是心非，其實並不尊重民主的原則，反對議會決定香港的重大事務奉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立法會的選舉，議員的產生，就是以票數的多寡決定勝負，絕對不能以一句「人多蝦人少」否決民主議事的原則，這是對香港三百多萬選民行使民主權利的侮辱。立法會議員的薪酬是香港市民的民脂民膏，每月工資十多萬元，七十個立法會議員每月的薪酬就達到一千二百萬元。如果按民主黨所說，拉布拉足四年，市民的公帑就損失五億七千萬，如果計算整個社會經濟和民生停頓所引起的經濟損

失，將高達數以十億元計。港珠澳大橋、灣仔繞道工程、香港到廣州的高速鐵路工程，都因為反對派政客採用議會、司法程序等各種手段阻撓和拉布，造成了建造費的不斷追加，損失過百億元公帑。立法會議員這種癱瘓民生運作的行為，是對公共資源的嚴重浪費，甚至是犯罪。如果這些損失的金錢用在扶貧方面，香港的弱勢社群生活將會好得多。

踐踏「少數服從多數」民主規則

立法會議員拉布並不是合理的民主權利，而是破壞和踐踏「少數服從多數」民主規則，是將立法會「垃圾化」的邪惡行為。立法議員提出以千計的「垃圾修訂」，阻撓時間，違反正常人的心智，表現了胡鬧和缺乏議政能力的特質。

梁國雄已經提出數百項修訂，又突然臨時再向財委會主席遞交二百多條「垃圾修訂」，包括要求特區政府就「長津」舉行諮詢論壇，並將舉行論壇的數目「分身」成為數十條修訂，又提出當局應參考社會退休保障制度的建議國家，涵蓋孟加拉、泰國、越南、柬埔寨、馬拉西亞、新加坡、以色列、芬蘭、冰島等等數十個國家的名字作為修訂，再加上數十項有關調高生果金方案的推出日期，重複又重複。這些垃圾修訂，得到反對派議員的配合和支持。反對派可以提出「會而不決，會而不議」的拉布方案，他們議論政治的效率、能力之低下，可以想見。他們還聲稱2017年競逐行政長官，這樣的思維能力和處事能力，一旦執政，一定會將香港搞得雞犬不寧、什麼事情也辦不成，香港市民被迫要吃西北風。

讓步將是一場大災難

這次「長者生活津貼」的角力，政府和建制派絕對不可以後退半步。這是癱瘓香港和維護香港的角力，這是香港合理運用資源扶貧還是走上希臘破產道路的命運角力。如果政府和建制派後退，少數凌駕多數，政府的運作能力喪失，成為香港議會的遊戲規則，這將是一場大災難。

第一個規則，香港的弱勢社群，特別是貧窮老人家，應該通過「長者生活津貼」給予救濟。香港的公帑應該運用到最需要救助的人口方面。如果不論貧富，不論財產多寡，吃大鑊飯，隨着人口老化，到2041年65歲以上人數將升至124萬，需花達327億元，這個數目還會隨通脹而調整，這必然造成香港特區政府的巨大財政赤字，影響主權評級，衝擊港元的穩定，使香港經濟受到巨大衝擊。為維護香港的長期穩定和經濟繁榮，特區政府決不能讓步。

第二個原則，基本法規定，有關與財政開支的議案，立法會不能通過議員提出修訂的方式，變相地提出一個新的財政支出方案，挑戰基本法的財政紀律。特區政府決不能讓步。

第三個原則，任何涉及民生福利和經濟基建開支預算的批准，應該在立法會批准撥款之後生效，而不是在立法會批准之前生效。特區政府決不能讓步。

第四個原則，立法會應該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則運作，決不能輸打贏要，讓少數人騎劫。騎劫是立法會的「恐怖主義」，用卑鄙手段要脅整個社會滿足少數人的不合理利益。梁國雄的拉布，只代表一部分激進的「憤青」，並不代表廣大弱勢社群和長者的利益，也不代表承擔主要稅務負擔的中產階級的利益，更不代表廣大市民的意志。特區政府必須體現民意，決不能讓步。

新加坡中國外勞罷工的啟示

曾淵滄博士

新加坡530萬人口當中，真正新加坡公民僅300多萬，就算加上永久公民，也不超過400萬。餘者，全是外籍勞工與外籍專業人士。新加坡經濟發展，外籍勞工與專業人士貢獻很大，原因很簡單，因為新加坡人的生育率很低，人口自然增長率很低，追不上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需要，只好向外聘用勞工與專業人士。聘用外籍勞工的目的是因為這些人多來自比新加坡貧窮的國家，薪金的要求較低，能為新加坡提供較低的勞動成本。聘用外籍專業人士是因為新加坡本身人才不足，不得不高薪向外尋求人才。

輸入外勞補新加坡人口不足

去年的國會選舉，外籍勞工與外籍專家成為競選課題之一。不少新加坡選民認為這些人搶了他們的飯碗，壓低他們的薪水，文化、生活習慣也不一樣。

新加坡人口以華人為主，外籍勞工中也有不少來自中國，也是華人，不過新加坡華人講英語為主，中國華人講普通話，文化上的確有一些不一樣。

過去許多年，相安無事，畢竟新加坡是個自由經濟社會，來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勞工與專家皆是自願前來，薪水是市場決定，你情我願。不過，近日終於爆發了第一宗集體的罷工事件，一群來自中國的巴士司機集體請病假，變相罷工。

2002年的中國，GDP總值是1.5萬億美元。2012年的中國，GDP總值已

激增至7.3萬億美元。換言之，中國人在中國的平均收入在過去10年已大幅增長數倍。

經濟增速快喚醒維權意識

人類社會往往是在一窮二白的時候，能活下去就已經很滿足。但是，當社會開始富有，維權意識就會產生。今日的中國，維護自己權利的意識高漲，每年中國各地都發生大大小小的維權運動、示威遊行……

中國人的維權運動發展到新加坡來了。新加坡嚴禁外勞罷工，非法示威。不過，這些中國來的勞工卻認為他們可以在中國罷工，就可以在新加坡罷工，他們要求薪水待遇與新加坡人一樣。當然，看在新加坡人的眼中，會認為這是你情我願的，沒人迫他們來新加坡工作，僱主也認為自己僱用外籍勞工，目的就是要省錢。不過，隨着中國越來越富裕，中國來的勞工，要求肯定會越來越高。過去10年，中國GDP每年以8%至12%的速度增長，如果未來10年也如此，10年之後，中國的GDP總額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作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國民，還願意像新加坡人的祖先一樣賣豬仔嗎？



曾淵滄